说，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史可法血战不屈的精神，包含着“爱国主义”的内容，继承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所以多尔衮与史可法虽然是战场上厮杀的对手，彼此势不两立，但却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地位，他们或因“立功”而载入史册，或以“立德”而名垂青史。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是评说古人的活动及其业绩的依据。时势造英雄。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其时代的风云人物，正如赵翼的一首诗所云：

李（白）杜（甫）诗篇万口传，如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这首诗虽然是就各代的文学家而言，但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则是颇有见地的，说明了“时代”与“人才”密不可分的关系。

---

①②⑬ 蒋良骐：《东华录》81页、69—70页、69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③ 《国史贰臣传表》，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
④ 徐有贞：《创建精忠庙碑记》，见《岳忠武王全集》。
⑤ 乾隆：《御制武穆论》，见《金佗粹编》卷首。又乾隆：《御制武穆祠诗》，见《岳忠武王全集》。
⑥ 《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5页。
⑧ 参看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史》，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又见斯当东：《英使觐见乾隆纪实》第19—21页。
⑨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169页。
⑩ 卫匡国：《鞑靼战纪》
⑪ 《金佗续编》卷8，《百氏昭忠录》、《王自中郢州忠烈行祠记》
⑫ 《清史列传》卷2，《和硕睿亲王多尔衮》。

如何评价清代历史人物

——第二次全国清史讨论会综述

薛瑞录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和辽宁大学历史系联合发起的第二次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在沈阳市举行。中共辽宁省委的领导同志出席了开幕式，并讲了话。来自全国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二十多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交流了学术研究成果。会议期间，与会者还兴致勃勃地前往清王朝的发祥地新宾县参观考察。

这次讨论会的总题目，是如何评价清代的历史人物。专家、学者向大会提供了这方面的论文七十余篇，涉及了数十个历史人物以及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问题。与会者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颇有所获。现将其概况撮述如下：

一、关于评价清代人物的理论、标准和方法问题

如所周知，明清之际处于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大变动时期。腐朽的明朝统治者、新兴的满族贵族集团和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三股政治力量互相角逐，激烈争夺，最后以明王朝的灭亡、农民军的失败和清王朝的建立而告结束，致使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十

分复杂多变，矛盾交错，千姿百态，脸谱各异。既有抗清的，又有降清的；既有抗而复降的，也有降而再叛的，等等。究竟怎样来正确评价这样一些历史人物？这成为清史研究中争议较多、难度较大的问题之一。因此，这次讨论会试图在这个问题上打开局面，有所突破。于是，与会者围绕着这一中心，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使得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日趋深入。

很多同志认为，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好清代的历史人物，就必须确定一个大致的标准和讲究一种科学的方法。王思治在《关于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一文中指出："评定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是根据其历史业绩和社会影响。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时期有时代提出的不同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人民群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反映出来的愿望，汇集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如果一个历史人物能够较好地解决他所面临的社会历史问题，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就应该肯定；反之，则应否定。这是评价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主要标准。"他还认为，清军入关，清王朝的建立，重建统一的中央政权，结束分裂恶战的局面，从当时历史的大局来看，是应予肯定的，这也是评定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当然，历史是极其复杂的，不能因为肯定清的统一，对降清者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以肯定，反之，凡抗清者就一律否定；肯定清的统一，并不是肯定满洲贵族的一切政策，那些为反对满洲贵族的民族压迫政策而奋起抗清的人物，同样应该加以肯定。商鸿逵在发言中说，评价清代的人物，主要看他对国家、对人民、对整个中华民族有无贡献；我们既不能站在明朝的立场上，也不能站在清朝的立场上，而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进行分析，才能做到既不溢美，也不隐恶。吴量恺的《评价历史人物与价值观》，力求从理论上加以解决。他认为，以往在对历史人物的研讨中，之所以产生一些偏向，主要是由于对历史人物缺乏价值性的研究，所谓价值，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时代的需要，阶级的需要，民族的需要等；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价值观评价历史人物，才能正确地估量其价值，这种价值观要求从事物本身的发展演变的连续过程中对历史人物进行全面考察，并须揭示出事物的内在联系、互相影响、因果关系，区分主流和支流，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鉴别那些是现象，那些是本质，力求把历史人物纳入社会发展的总规律中进行分析。李鸿彬在文章中说，评价清代的历史人物，应坚持"严格的历史性"，要把他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对其地位和作用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由于清初历史的复杂性，我们肯定进行统一大业的历史人物，不等于就否定坚持抗清的明朝将领和农民军领袖，这并非矛盾，恰恰是评价清初这个特定历史时期人物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李治亭在发言中提出了评价清代人物的三条原则：第一、从祖国大一统的原则出发，凡是积极促进我国的安定统一者，都应该给予程度不同的肯定；第二、从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原则出发，凡是维护或促进我国各个民族之间的联合和团结者，都应当给予程度不同的肯定，纠正那种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即为非法、汉人参加少数民族政权则为汉奸等偏向；第三、从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的原则出发，凡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顺乎民心者，都要给予程度不同的肯定。在这三条原则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不少同志还认为，清代的历史人物既然如此错综复杂，那末，在评价这些人物时，仅仅使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必须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这把解剖刀，对每一人物进行全面的考察，辩证的分析，采取"阶段论"、"方面论"、或"综合论"等方法，克服"简单化"和"片面性"等不良倾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通过讨论，与会者对此问题的认识更明确了，有的地方已趋于一致。

二、关于清人关前的人物评价

从大会收到的论文来看，有关入关前的人物评价达二十多篇，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其中，有许多文章发掘了新史料，提出了新观点，特别是有些文章专门研讨了过去几乎无人触及、但在清朝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的诸王、贝勒、五大臣和汉官等，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

刘庆华的《努尔哈赤立国思想浅探》、刘建新的《努尔哈赤军事思想评述》、王冰的《努尔哈赤与辽阳》和王明琦的《努尔哈赤宫室与沈阳城九门——兼谈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因》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努尔哈赤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及其历史功绩。

冯年臻的《舒尔哈齐死因新探》，对舒尔哈齐死于权力之争的成说提出质疑，认为努尔哈赤、舒尔哈齐兄弟之间的斗争决不单是权力的争夺，而是一场“拥明”与“叛明”的斗争。

魏鉴勋、袁闾锟在《试论皇太极的个性——从修身谈起》中指出，在执掌后金政权的四大贝勒当中，皇太极比代善刚毅勇敢，有胆有识；比阿敏和莽古尔泰目光远大，仁厚机智，不为民族偏见所拘。因此，在努尔哈赤死后，发扬其事业的历史重担，便落到了皇太极身上。朱诚如的《关于皇太极评价中的一个问题》，认为过去有些论者对皇太极的民族政策评价过高；实际上，皇太极时期在处理满汉民族关系上所采取的政策是充满民族压迫和歧视的，他“宽待”和“恩养”的只是汉族地主阶级，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族人民承受着残酷的压迫和歧视。姜守鹏的《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关系——“毛文龙书信”简析》，考查和分析了毛文龙同皇太极之间的书信往来，认为毛在皮岛前期抵抗后金侵犯有功于明朝，后期已成为一个独行海外的封建割据势力；为了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力量，他确曾多次同后金接触。

李景兰的《简评储英》，叙述了储英的赫赫战功、委为继嗣及其被杀的原因，认为储英之死是努尔哈赤独裁政治的牺牲品。

陈涴的《论代善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和佟铮的《评代善》，均论述了代善一生的历史功勋，认为他外征战、内安帮，在清史上留下了可贵的一页。

侯寿昌的《浅论佟养性》和王革生的《清朝开国功臣佟养性》，依据档案史材，评述了佟养性归清后所建树的业绩，认为他提出的改革措施加速了后金的建封化过程，使后金的财政经济好转，军事威力增强，从而为清军入关、统一中国创造了条件。

孙文良、李治亭的《论清朝开国勋臣何和礼》，认为何和礼作为位高权重的五大臣之一，辅佐努尔哈赤获得境内的“大治”和创建后金皇朝，表明他是清初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关嘉录在《费英东述评》中说，费英东是努尔哈赤最亲近的大臣之一，他在促进满族的形成和发展、捍卫后金政权的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张玉兴的《范文程归清考辨》，认为范是在天命三年，努尔哈赤率军攻破抚顺时被掳获的，并隶镶黄旗下为奴；至天聪三年考试儒生，始出奴隶籍而拔置文馆使用，后逐渐升迁，受到重用。所谓范文程“有感于明衰清兴的形势，毅然投奔努尔哈赤”等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

李鸿彬的《试论洪承畴在清初统一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和刘德鸿的《洪承畴清初作为述评》，均对洪承畴这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重要人物作了新的探索。李文认为，洪归清以后，积极投身到统一全国的洪流中去，并作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刘文则从建言中机、招抚见效、经略有方这三方面，论述了洪承畴的历史功绩。

江桥的《简论石廷柱》，分析了石廷柱降清后的经历，认为汉军在后金及清初的军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王佩环、王爱军的《简评刘兴祚》，认为刘先于孔、耿、尚三王而归后金，曾受到努尔哈赤的重用，后因不满于努尔哈赤的民族高压政策，复叛而归明，坚持抗清斗争，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

郭成康在《论文馆儒臣及其对清初政治的影响》中指出，文馆儒臣在后金政权体制、典章制度等方面的逐步封建化和在策略上争取蒙古诸部的归附这两大关键问题上，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关于顺康雍时期的人物评价

这是清王朝建立和日益强盛的历史时期。史学界对这个时期的人物一直比较重视。此次大会的论文中，也数这一时期的为最多，计有三十二篇。涉及人物的范围也比较广。

姜相顺的《略论孝庄文皇后》，认为孝庄文皇后的主要功劳，在于辅佐两位幼年皇帝坐镇中国的一统江山，在顺治中期和康熙初期实行舒缓的统治政策，恢复和发展了生产，为康雍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金成基的《论福临》和王廷元的《试论顺治帝与清初的“法明”政策》，是评价顺治的两篇长文。前者认为福临是清王朝入主中原的第一代皇帝，在他亲政的十年间，正是清朝从入关后的大动乱，逐步走向统一和稳定、满汉地主阶级进一步加强联合、重建封建统治的十年。在这十年里，福临所起的重大作用是不可抹煞的。后者指出，顺治帝亲政期间，排除了守旧势力的干扰，恢复了内阁六部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又对赋役制度进行了整顿，使其稍复万历时的旧观，这些措施表明他在推行法明政策上是有贡献的。

刘潞《关于康熙文化政策的几个问题》，李国梁、布尼阿林《试论康熙、乾隆的民族政策》和黄崇文《溥仁寺的建立及其康熙的对蒙政策》，是一组论述康熙统治政策的文章。刘文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在中国统治近三百年之久，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能积极地接受汉族文化传统，尊重和敢于使用汉族的知识分子，而康熙对这种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践则做出了特殊贡献。李文指出，康熙、乾隆以毕生的精力，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兴盛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他们利用联姻、尊重信仰、封爵、召见、赏赐等各种办法，加强了各个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使它们团结在清政府的周围。黄文则认为，康熙通过溥仁寺的建立和其它政策的施行，使蒙古王公不仅从心理和血缘上，而且从政治、经济的利益上，都与清廷结成了牢固的联系。

陈支平的《试论雍正的阴谋嗣位对其政治的影响》、奇文英的《雍正与军机处》和梁希哲的《试论清世宗的吏治思想》等文，比较深入地评述了雍正帝及其主要政绩。

张嘉沧的《略论入清后的冯铨》，认为冯铨降清后，从政治经济制度的调整与完善方面和对封建文化的传播发展方面，均起了作用。

郑玉英的《宁完我简论》和王冬芳的《谈宁完我》，对宁完我为清朝辅政三十余年的功绩与弱点进行了评述。

周远廉、赵世瑜在《论鳌拜辅政》中指出，通过对鳌拜及其辅政时期各项政策的考察，发现无论是鳌拜个人还是他辅政的情况，都比较复杂，既难于一笔抹煞，也不宜全盘肯定；因而不能过高估计康熙捉鳌拜的社会意义，更不能把它说成是扭转乾坤之举。

杨余练的《论吴三桂与三藩战争》，认为三藩战争的起因和过程反映了它的两重性：一方面，“四大臣”的十年乱政，是引起三藩战乱的根本原因；另方面，吴三桂等汉人军阀反清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住割据云贵的地位，妄图分裂国家，与当时趋于统一的潮流背道而驰，决定了他们失败的命运。

商鸿逵在《康熙平定三藩中的西北三汉将》中指出，从平藩的全部战局看，特别是从西北侧面的战局看，如果没有汉将汉兵的参加，清朝的胜利是不可能取得的。

何溥滢的《简论彭春》，谈到了彭春在平定叛乱、反对分裂以及抵抗外来侵略上的功绩。

李格的《许定国事迹研究》，论述了许降清的原因、经过及其所起的作用。

陈明猷的《姚启圣的历史功绩》，叙述了福建总督姚启圣在清朝统一台湾中的作用。

王永谦的《靳辅治河》，系统地论述了靳辅治黄河的业绩。

范同寿的《鄂尔泰及其经济思想浅析》和胡克敏的《鄂尔泰与贵州的改土归流》，均对鄂尔泰在云贵地区的显著政绩加以肯定。

李洵的《孙嘉淦与雍乾政治》，依据孙嘉淦的一些传记材料，对清代雍乾时期的政治特征和官僚机构腐朽化的问题，作了新的探索。

徐凯的《岳钟琪论》，评述了清朝名将岳钟琪献身于保卫祖国边疆的一生及其功勋。

徐和雍的《关于张煌言的评价》、陈权清《何腾蛟与湘楚军民抗清斗争》、熊宗江的《论孙可望与大西军的联明抗清》和薛瑞录的《关于朱益吾的籍贯及其反清活动》等文，都对这一时期的几位重要抗清人物作了论述。

陈生玺、刘光胜的《黄宗羲思想及其“明夷待访录”析要》、刘清扬的《唐甄的社会思想》、薛虹的《函可和冰天诗社》、杨旸、傅朗云的《论爱国流人寒儒吴兆骞》和孙德昌的《指画家——高其佩》等文，则对这一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人物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四、关于乾嘉道时期的人物评价

这是清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的人物身上，也多少反映了这样的历史特点。

郭蕴静《浅议乾隆帝对社会生产的促进和阻碍》、夏家骏《乾隆惩贪述评》、陈祖武《清高宗与海成》和齐清顺的《乾隆皇帝统治新疆的几项重要措施》等，是一组探索乾隆及其政绩的文章。与上次讨论会相比，这次讨论会评价乾隆的论文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在研究的深度上也有所升华。郭文认为，乾隆完全继承了康雍时期的经济政策，以农为主，兼顾工商，使社会生产能以较快的速度持续发展。但由于他是继承祖业，缺乏创造和改革，因而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加之乾隆在统治上的腐朽，更加速了清朝的衰败过程。夏文则说，乾隆时期天下承平日久，官员腐化日深，贪官数目也就日多，这不能不使惩治贪官、澄清吏治成为乾隆整个政治活动中一项最主要的内容；在这个问题上，乾隆的认识与努力也自然不能不在很多方面比康熙、雍正有过之而无不及。陈文认为，乾隆也是清朝一个有才识、有作为的皇帝、《四库全书》即成于其当政之时。不过，乾隆在从事文化上这一建树的同时，却也给中国古代文化横加了一场劫难。锢蔽文化、钳制思想、实行封建文化专制，有清一代即以其统治时期、尤其是纂修《四库全书》之时，最为酷烈。齐文指出，乾隆为了在新疆巩固其统治，曾采取一系列措施，主要有：军事上——把军府制统治中心放在天山北路；政治上——推行多种统治制度；民族关系上——对当地各族上层人物的分化控制和笼络利用；经济上——

以屯田垦荒为基础恢复发展生产。此外，还有栗振复的《乾隆辩》一文。

关文发在《评嘉庆帝》中说，对嘉庆的评价，应该联系到乾嘉之际的基本局势，清代之中衰，不应由他负主要责任；他亲政后，对乾隆晚年的种种弊政，确实是有所匡补的，也是有过一番作为的；在吏治问题上之所以未能扭转过来，固然与他为政失之过宽有关，但这个问题已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要想改变这一总的历史趋势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张杰的《阿桂与伊犁屯田》，认为清将阿桂在新疆首创伊犁屯田，对于该地区经济的开发、西北国防的巩固及其后来设立行省，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正明的《栗毓美治河述论》，谈到了道光年间的治河专家栗毓美创行了抛砖筑坝法，为我国古代水利事业建立了功绩。

刘汉屏的《章学诚是清中叶启蒙思想家的前驱》，重点论述了章学诚的哲学思想及其改革思想。

王俊义的《钱大听学术思想述略——兼论对乾嘉学者的评价问题》，围绕钱大昕的学术思想，就其治学道路、宗旨、态度、成就和影响等方面作了探讨，并对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陈金陵在《发出维新呼声的法式善》中指出，蒙古学者、国子监祭酒法式善于乾隆死后，首先向嘉庆帝发出了“亲政维新”的呼声，他谏议在简拔人才、整顿吏治、发展生产等方面进行刷新，但遭到嘉庆帝的反对和打击。

张晓虎的《朱之瑜评传》，认为中国学者朱之瑜在日本的二十多年间，不仅同日本的学术界、思想界的接触是大量的，而且广泛地涉及到工程设计、建筑技术、农圃梓匠、生物医药、地理知识等各个方面，在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史上发生了影响。

另外，大会收到的论文中，尚有其它研究专题的。例如，徐恒晋的《八旗制度述论》、孟昭信的《八旗奴仆分档开户问题》、冯元魁的《论清朝皇嗣制度》、季士家的《清代题奏制度沿革考释》、陈生玺的《清初剃发令的颁布与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唐景绅的《简论清初甘肃回民起义》、邢凤麟、海阳的《关于马神甫事件》和沈雨梧的《李世贤传》等。

从十五世纪建州女真阶级关系的变化看奴隶制生产关系之确立

李　景　兰

明代生活在东北地区之女真族，其社会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的发展阶段，以及何时进入奴隶制，是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本文亦拟通过对十五世纪建州女真阶级关系变化的剖析，探讨其奴隶制生产关系之确立。

明朝初年，根据女真人的分布地域和经济发展程度，将其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分。所谓建州女真，系指元时对居住在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一带（以依兰为中心）的女真人。明初，他们因遭受“兀狄哈”（野人女真）达乙麻赤的攻击，逐渐向南迁移，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移至绥芬河上游和图门江下游地区，此地原是渤海时的建州故地，永乐元年（1403年）于此地设建州卫，故称这部分女真人为建州女真。建州女真是后来形成满族的